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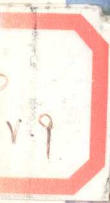
文景Literature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第九辑 5-6/03

技术文明时代的 人与自然

后现代哲学话语
法国学者看美国
思想的下沉者
不透明的写作



“发现之旅”丛书

系一套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授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引进的

大型系列图文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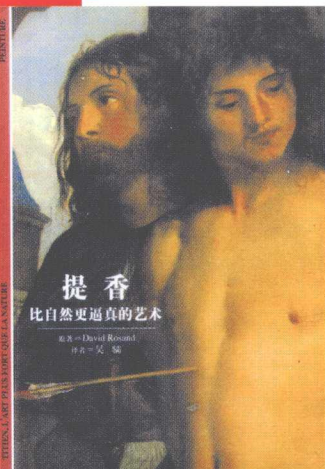
丛书囊括自然、历史、地理、气象、人物、

科学技术、人文等方面的内容，

知识丰富、资料翔实、画面生动、印刷精美。

1999年出版第一辑时，

被誉为“开中国当代图文读物先河”的品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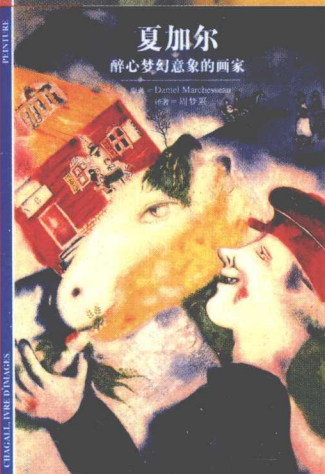
《提香——比自然更逼真的艺术》

著者: David Roand

译者: 吴骥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1576年提香出世,享年99岁。一个世纪的绘画神话,在威尼斯度过的一生,让他和天子诸侯一样,享尽了人世的荣华尊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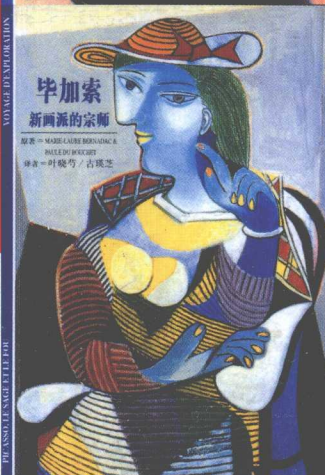


《毕加索——新画派的宗师》

著者: Msrie-Laure Bernadac

译者: 叶晓苟 古瑛芝

本书以亲切的文字,介绍了毕加索的一生,从西班牙的童年,直至长期定居巴黎花都的岁月;书中还细腻地描述他的爱情与友情,刻画他的创作历程——如何自贫困至备受世人推崇的艺术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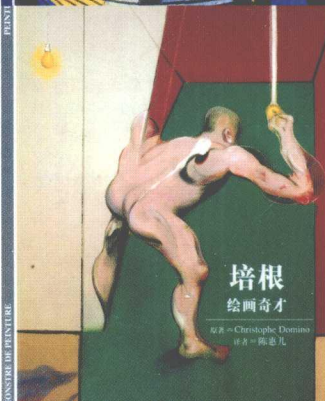


《夏加尔——醉心梦幻意象的画家》

著者: Daniel Marchesseau

译者: 周梦黑

夏加尔是继马蒂斯与毕加索之后巴黎画派中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家。本书对这位两度流亡的俄罗斯人的人生轨迹作了一番回顾性的综述。



《培根——绘画奇才》

著者: Christophe Dom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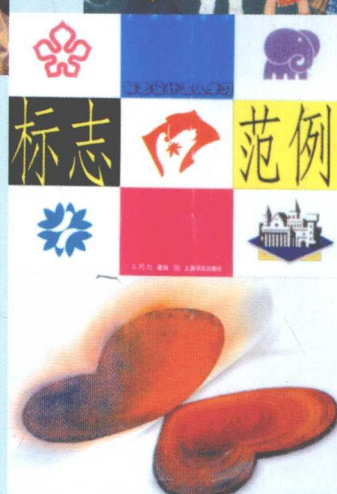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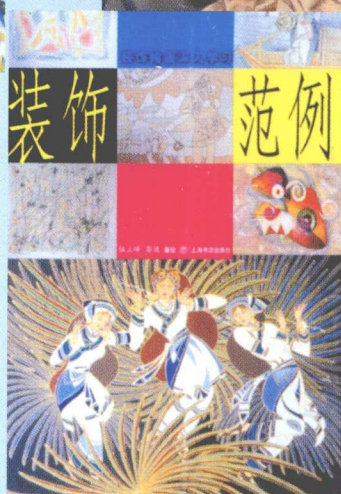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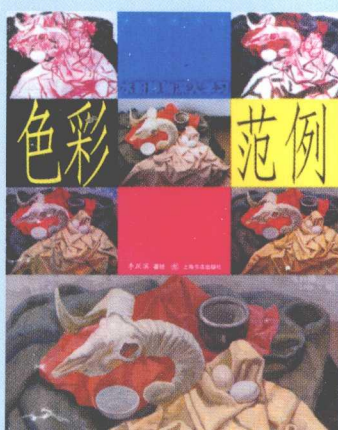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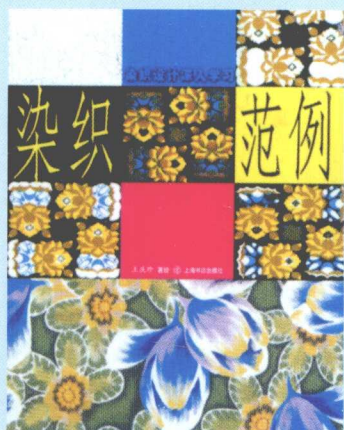
译者: 陈惠儿

培根是艺术史上献身艺术的巨人之一。他善于用他的艺术让大多数人领悟到“某中更加深沉的东西,比协调和意识、比感情和人类命运更深刻”。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最新推出

本套系列书系,汇集了全国美术院校各专业及综合性大学美术设计专业历届考题。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列出了方法步骤,又配有详尽的文字说明,还针对一些学生作业加以解析,有助于美术类高考生和在校大学生学习和参考。



《学练画书系》



《文景》已经出版到第8辑了。还记得去年阅读第1,2辑时的感觉。那时的《文景》,还是小开本,文章厚重,装帧典雅,在时下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显得与众不同。

我生平爱读书,也爱读评论书刊的杂志。以最近二十年而论,我曾是北京《读书》、上海《书城》的忠实读者,有数年之久还是这两本杂志的作者。

当时《读书》和《书城》的作者大多数是知名作家。恕我直言,没有写出过出色作品的作家很难达到知名的程度,但作家一旦知名之后,却不一定都能继续写出出色的作品。但读《文景》,我惊喜地发现,虽然知名度高的作者不少,但是,执笔者对他所论述的学科或专题,却确是研究有素的。在这一学术领域或艺术领域,是行家,所以不是泛泛而谈,切入点恰到好处。他对一部著作,一个作家的剖析,就能如庖丁解牛那样清晰利落。

《文景》第1、第5、第6辑中都有赵一凡的文章。赵一凡自然属于知名度相当高的作者,他却没有粗制滥造。《反观英美批评传统》写得非常简明概要。《后现代史话》写得潇洒自如。赵一凡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分析与批评,要言不凡,极有见地,看得出他读书很认真,这是他文章写深写透的关键。

记得还在《文景》第2辑中读过章乐天的文章《在海边墓穴上咀嚼玫瑰花瓣》,说的是《瓦雷里与纪德通信选》,很引人入胜。瓦雷里与纪德的通信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诗,他们用宁静的心态,谈论文化名人与文化名城。章乐天在写这篇读后感时,不知不觉之间,也感染到了瓦雷里与纪德的许多文采或气氛,把我们带进了这个两人世界。这使我常常想到某某解说词或文章搬用尽了一切重重叠叠的形容词,甚至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但听者、读者反映仍旧不热烈。看来写文章感情真挚、措词准确仍是最重要的,不可缺一。

从后来几辑《文景》中可以看到,《文景》的视野非常宽广。《文景》所发几篇有关经济学的文章别开生面,对经济学毫无兴趣的读者也会着迷的。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接触到了建筑、绘画、电影等领域。

任何学术领域,艺术领域,无分国内与国外,值得向读者介绍的,《文景》都给予篇幅。我认为在世界日益变小的今天,在多方面寻求与国外接轨的今天,这样做也是恰当的、明智的。

上海读者 蒋星煜

拿到新一辑《文景》,眼前不禁一亮,封面上米兰·昆德拉略带几分冷峻的肖像着实吸引了我。此次译文出版社推出昆德拉作品新译系列,掀起了新一轮昆德拉热,贵刊在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个热点,尤其是董强先生的文章,作为昆德拉在大陆的弟子,他不仅写出了亲炙大师的心得,而且还介绍了昆德拉作品的新译情况,让昆德拉迷们过足了一把瘾。

我注意到,这一辑《文景》有不少见解独到的好文章。比如,陈彩虹先生的文章对向称晦涩的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读后受益匪浅;而李翔宁先生对戏剧与剧场的纵横演绎也让人大开眼界。此外,对本雅明的《驼背小人》、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以及《新美利坚帝国》等新书的介绍,都是集书界热点与精彩分析于一炉的好文章。

在如今书籍众多、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特别需要像《文景》这样的书评杂志披沙拣金,和读者分享阅读的愉快和收获。衷心希望贵刊能不断抓住书界热点,推出更多佳作,这不仅是书界之幸,更是读者之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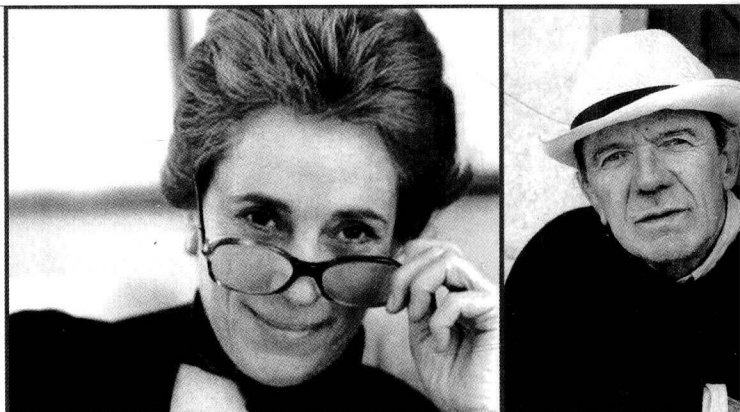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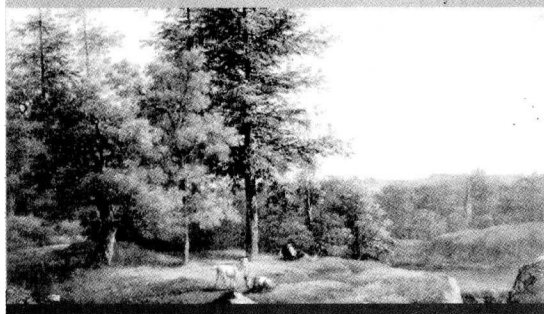
上海中江路小区 张世众

技术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

人是动物的最大天敌，自然界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也在不断制造对付这个天敌的武器。

今天的人仿佛生活在一种无起源无根据的时代，因而也生活在一种只讲索取不知感恩的时代。

人能以技术的方式介入自然并参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人也就能以技术的方式医治自然的创伤。人缺少的仅仅是人对自然的责任感、虔诚心和感恩情。



吉鲁是法国新闻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她不但是法国最大的新闻周刊《快报》的老板，也是著名作家。

在德勒兹看来，下沉与上浮生
成一条事关生死的交织线。

封面

- | | | |
|----|-------------|-----|
| 4 | 技术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 | 汪堂家 |
| 10 | 我的“非典”笔记 | 汤拥华 |

关注

- | | | |
|----|---------|-----|
| 16 | 后现代哲学话语 | 赵一凡 |
|----|---------|-----|

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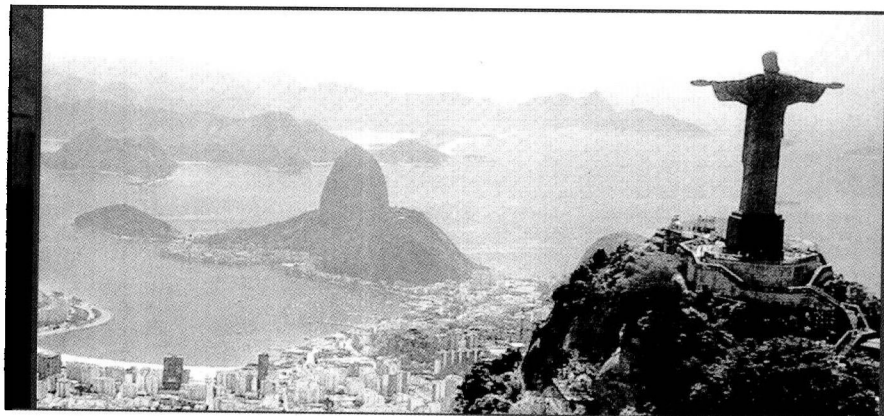
- | | | |
|----|------------|-----------|
| 25 | 法国学者看美国 | 陈彦 |
| 36 | 国家与市场 | 王跃生 |
| 39 | 神奇缤纷说太阳 | 方明光 |
| 40 | 漫游的数学诗人 | 万宇 |
| 42 |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病毒 | 陆地 |
| 44 | 破碎的玻璃世界 | 涂卫群 |
| 46 | 走出管理困境 | 韦森 |
| 50 | 大英帝国诗人吉卜林 | 克里斯托弗·希金森 |
| 57 | 别出心裁的文学解读 | 钱钢 |

艺术

- | | | |
|-----|-----------|-----|
| 60 | 最后的银幕告白 | 赵练 |
| 64 | 图像时代的符号游戏 | 汪民安 |
| 106 | 看碟读书：《诺言》 | 止庵 |

剪影

- | | | |
|----|---------------|-----|
| 66 | 一个法国知识女性的亮丽人生 | 胡小跃 |
|----|---------------|-----|



它屹立在天地之间,仿佛刚刚自天空落下,君临大地,又仿佛已屹立千年。

72 思想的下沉者 于奇智

书斋中来

78 论五 耿辛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杂谈之四

82 《过半刃言》、《黻爻》、《衍变通论》引言 张文江

83 张孝祥《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及其它 朱志泊

手记

33 不透明的写作 吴亮

87 读荷马随笔 崔卫平

89 卡尔维诺的小说 车前子

34 饮食文化与环境 陈彩虹

93 翻书偶记 刘漫流

视野

91 平面上的独舞者 钱魏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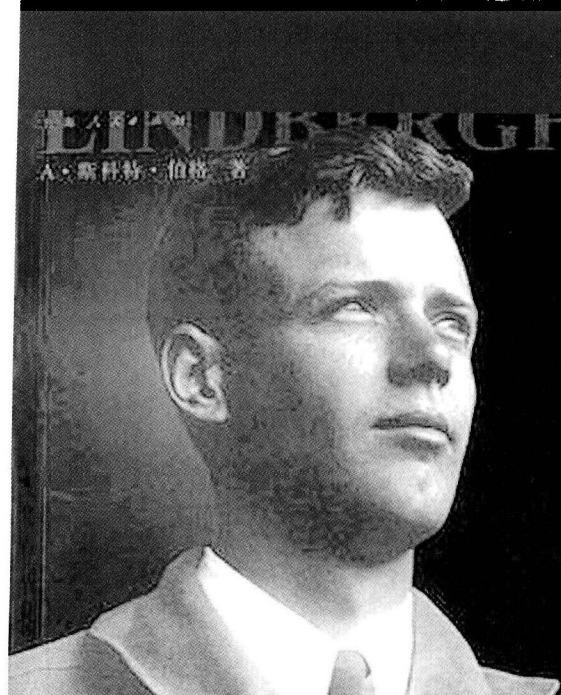
96 记圣彼得堡的“基督复活教堂” 闻一

101 从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 西川

书摘

110 动物,病菌与人类疾病 贾雷德·戴蒙德

书林印象 异国书情 刊海掠影



《美国空中英雄——林德伯格传奇》

著者:[美]A·斯科特·伯格

编译者:谢毅、李国俊、王坤、吴飞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
是美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
物。1927 年 5 月,他

驾驶小飞机从纽约到巴黎
飞行了三十多个小时,完成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

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在二战期间,他反对美国参加反法
西斯战争,引起广泛的争议。

战后,他帮助发起太空计划,探查
濒危动物种群,倡导生态保护,研
究器官移植、考古学和人类学等,
都成绩斐然。

本书以细腻传神的笔触,描绘了
传主传奇般的一生。



技术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

今天的人仿佛生活在一种无起源无根据的时代，因而也生活在一种只讲索取不知感恩的时代。

人能以技术的方式介入自然并参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人也就能以技术的方式医治自然的创伤。人缺少的仅仅是对自然的责任感、虔诚心和感恩情。

■ 汪堂家

眼下正在蔓延的 SARS 病（非典型肺炎）剥夺了许许多多被我们视为最高价值的生命，给许多病人带来了深深的痛苦，给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几乎不需要特别的洞察力就能发现 SARS 病对我国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为防止合理的恐惧演变成不合理的恐慌，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这

些已经产生以及还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消除这种影响的同时深入思考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对灾难性事件的预警能力，并预研对策，防患于未然之际，消灭于未成之时。

以祸福相依的观点看，这次巨大的灾难也给我们间接地带来了一些可资利用的因素：它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被一度掩盖的许多问题，唤醒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

激发了社会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和同舟共济的精神,改善了我们这个社会因种种原因而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迫使我们广大社会成员改变普遍存在的不良卫生习惯和有损公共道德的不高尚行为,间接推动了“电子政府”和一些城市的公共电子教育网络、医疗信息网络的形成,提出了国家卫生资源的合理共享和合理分配的正当要求,强化了某些人群中早已淡化的亲情、友情和家庭的归属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医的独特地位以及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激起了广大科研人员和相关国家对科研交流与合作的热情。

凡此种种足以让我们从危机中看到机会。认识这种机会,有效地利用各种积极因素,既可以使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多一点冷静、从容与乐观,又可以使我们多一份信心与勇气,也可以使我们敏感地发现和深入地认识社会的普遍心态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还可以使我们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更可以使我们从教训中学习,从危机中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并防止新的危险再次出现。

1

SARS 病的出现给我们重新提出了许多生态伦理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该以何种方式与动物共处?

现在许多病毒学家正在追踪 SARS 病毒的来源,在没有找到确切

答案之前,我们自然无法妄下断言。但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SARS 病毒要么是一种已知病毒的变异,要么是野生动物直接传染给人的。前一种说法已经得到了两岸三地的科学家以及加拿大的科学家刚刚公布的结果的支持。因为他们分别发现引起四个地方的 SARS 病的病毒并不完全一致,从而说明 SARS 病毒会发生变异,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没有回答 SARS 病毒的最终来源问题。后一种

人是动物的最大天敌,自然界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也在不断制造对付这个天敌的武器。

说法可能来自对最早发病病人的行为的调查,因为有人发现该病人有接触野生动物的经历,因而怀疑该病人有可能从动物那里感染了 SARS 病毒。但这种说法仍是一种猜测,因为有些人可能感染了 SARS 病毒但自身因免疫系统的作用而没有发病。所以,要等到科学家们在某种动物身上发现了这类病毒并发现其确切传播方式之后才能证实这种猜测。

然而,根据历史的经验,这的确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猜测。科学家已经证实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共有二十多种新病毒出现。其中给全球几千万人带来灾难的艾滋病毒(HIV-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英文缩写)已被证明是

从灵长类动物那里传染来的,引起埃博拉出血热病并导致百分之八十感染者死亡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很可能来自蝙蝠。不管对 SARS 病毒来源的猜测是否正确,我们都需要重新审视和检讨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人与动物(包括微生物)的新型关系。

人是动物的最大天敌,自然界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也在不断制造对付这个天敌的武器,正如德国建构主义哲学家 Mittelstrass 所说:“人对环境的适应始终是环境适应人的需要与实践的结果。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世界,而且,众所周知,它也在自身中包含自我毁灭的萌芽。”人常常因为处于生物链的顶端而随意奴役其他动物,并试图以自己的智慧控制乃至灭绝这些动物。今天人类试图抹平自然界经过几百万年才确立起来的物种差别,他们不仅打破动物物种的差别,而且打破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的差别,把不同的动物的基因加以改变导致了转基因动物的出现。随着生命科学的凯歌行进,人类甚至可以创造新的物种并且人类已从既有的科技成就当中得到了莫大的利益。但也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变得狂傲起来,他们在打倒上帝的同时试图把自己确立为上帝。

人类对其它生物的“恐怖主义”行为远远不止这些。人类残忍地杀死那些对自己无害的野生动物,并且食其肉而寝其皮。原始人曾有各种禁忌来维持人与其他动物的平衡,比如,

许多原始部落都有崇拜动物的现象。有趣的是,食草动物很少成为崇拜的对象,只有大象除外。猛兽与猛禽成为原始人崇拜的对象,也许是因为原始人敬畏自然的伟力。与这种现象巧合的是,猛兽与猛禽恰恰掌握着维持生物界平衡的钥匙。对野猪的跟踪研究表明当没有虎豹吃掉野猪时,野猪会大量繁殖,但这时会有周期性的瘟疫来维持野猪的相对适度的数量。一旦野猪有了天敌,它们会变得更加强壮,瘟疫则极少发生。这一点很像鱼塘中有一条黑鱼,其他鱼反倒很少生病一样。

现在,除了环保主义者和真正的佛教徒外,你大概很难见到有人对野生动物有稍稍的仁慈。君不见,捕捉和贩卖野生动物在一些地方大畅其道,食用野生动物成了不少人的可怕嗜好。马可·波罗曾说,中国人食谱之杂,天下无双,凡有腿的东西,中国人都吃,只有桌子除外。几百年过去了,国人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习惯,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殊不知,当我们捕捉、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时,我们也大大增加了将野生动物身上的有害细菌、致命病毒和寄生虫传染给人类的机会。森林里的细菌、致命病毒和寄生虫进入人体与随意捕捉贩卖和贪吃野生动物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对自然资源的过多开采和大量植被、森林遭到破坏必然使原本栖息于森林的动物逃向人的生活领域并将它们携带的细菌和病毒扩散到人类生活的领域,这一点已

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生物界为维持自身平衡对人的非理性行为作出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反应。人类虽是社会化的动物,但他毕竟也是动物,他纵然有千般智慧,万般能耐,也无法摆脱生物界的铁的法则。SARS病毒的蔓延应把国人从无视生物界平衡的迷梦中惊醒!现在该是对捕捉、贩卖和食用违禁野生动物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措施和全面教育的时候了。

2

SARS 引

起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最应当警惕的

恐怕还是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的无知。另一方面,人类在消灭已有疾病的同时又不断受到新疾病的折磨。人与疾病的斗争在许多方面似乎成了人与细菌和病毒的斗争,人试图将药物和免疫制剂(包括疫苗)作为自己免疫系统的人为延伸,但人的天然免疫系统似乎正在退化。这就像人类发明了眼镜,但人的视力的退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很可能超过了过去上千年退化的总和一样。人类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抗生素,但细菌也在一代又一代地变异;肝炎病毒、艾滋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尚未制服,SARS病毒又冒了出来,人类是否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一味地强调与其它生物(包括微生物)的斗争,而要

力放在维护人与其它生物的和谐共存上呢?人在用广谱抗生素杀死有害细菌时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了那些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如果这些有益的细菌也有智慧,它们肯定会把“恐怖主义者”的标签贴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们应该知道微生物也维持着某种奇妙的平衡,滥用抗生素则打破了这种微生态平衡。这就使得细菌和

病毒不断以变异的方式来适应被破坏坏了的环境。现在我们可以大小药店毋需处方随意购买抗

我们最应当警惕的恐怕还是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的无知。微生物也维持着某种奇妙的平衡,滥用抗生素则打破了这种微生态平衡。

生素,一些医生也在那里不负责任地滥开抗生素,许多病人更是出于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的无知而要求医生给自己开本不需要服用的的抗生素,且越多越好,更有甚者在未获得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胡乱服用抗生素。其潜在后果是一些病菌和病毒产生了耐药性,原有药物渐渐不起作用,即便不断开发出新的抗生素,其开发的速度也难以跟上细菌和病毒变异的速度,以致引起疾病的新细菌和新病毒越来越难以对付。在水产养殖和家禽、家兽的饲养过程中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在我国非常普遍,这更造成了我们的微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为大量抗生素的残留物通过食物链重新进入了人体,破坏了人体的微生

态平衡,也破坏了整个生活环境的微生态平衡。如果我们还不正视这一问题并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类似于 SARS 病的其他疾病只能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有必要吸取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训,同时也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比如,对抗生素的源头——药店和医院进行严格的管理,请有关专家就抗生素的使用对医生、养殖场和饲料厂主进行培训,向广大民众大力宣传滥用抗生素对自己的长远健康和他人健康的危害。

3

SARS 病在二十八个国家的迅速蔓延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健康问题的全球性。在我们这个人与人日益依存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出现的传染病会像“多米诺效应”一样迅速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也迅速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甚至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二十世纪初导致十余万人死亡的流感曾使西欧国

家无一幸免地遭受重大打击。自 1981 年在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已蔓延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病毒携带者多达几千万人。自 1976 年 6 月在苏丹埃博拉谷地出现

第一个埃博拉出血热病人以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已有几百人在发病后死亡。所幸这种急性传染病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地区,如果发生在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这种病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健康问题的全球性降低了以国家为实施主体的生物恐怖主义的危险,但大大增加了国际恐怖组织或地区性恐怖组织采用生物恐怖手段制造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和破坏性。之所以出现前一种情况,不仅是因为发动生物恐怖袭击的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可能不意识到人员的全球性流动最终将使本国人也成为生物恐怖袭击的牺牲品,而且是因为一旦发动生物恐怖袭击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所确认,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全球声讨的对象。这一点增加了对使用生物武器的政府的无形压力。之所以出现后一种情况,是因为

健康问题的全球性降低了以国家为实施主体的生物恐怖主义的危险,但大大增加了国际恐怖组织或地区性恐怖组织采用生物恐怖手段制造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和破坏性。

为“故意伤害或杀死无辜的平民”,把恐怖主义者描述为“卑鄙的罪犯”(参见 Haig Hatchadourian 《Terrorism and Morality》,in: Applied Ethics, ed. by Larry May . etc. Prentice-Hall

Inc, 1998, P285-294)。一旦恐怖分子掌握了分离、培养和释放致命细菌与病毒的技术手段,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由于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使用一开始难以觉察,一旦一些邪恶势力和恐怖组织像日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等公共场所使用沙林毒气那样,将致命的细菌或病毒施放于国际人员往来频繁的城市,它所造成的灾难将会很快成为国际性灾难并可能长期影响人类的健康。因为一旦新的细菌和病毒无法用有效药物和疫苗加以清除,它们就将在人群之中长期存在下去。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没有根据说 SARS 病毒与生物恐怖主义有关。然而,在没有确定病毒的确切来源之前,我们应当想到任何一种可能性。SARS 病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是,我们应付大规模传染病的物质技术手段还很不完美,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如此;我们的疾病预警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还有待加强,我们对新兴传染病的突发还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和预防知识。美国人口密集的纽约之所以有效制止 SARS 病的蔓延,不仅是因为那里出现该病的时间较晚,使人们有时间做好准备,而且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人有过受炭疽菌袭击的教训,广大民众有防生物武器袭击的心理准备和相应的知识,社会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范系统。今天,我们需要以开放的胸怀吸取其它国家在防治疫病方面的

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包括学习其它国家为应对大规模生物恐怖袭击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可能的预案和对策,把防治传染病与防止可能的生物恐怖袭击(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结合起来,这样既能节省财力、物力与人力,又能降低一旦出现疫情而造成的损失。我国有居安思危的传统,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光大这一传统。我国有“治病不如防病”的古训,我们今天仍有必要牢记这一古训,而不应当错误地以为生物恐怖袭击绝不会发生。

实际上,恐怖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按照 Leiser 的定义,“恐怖主义是一系列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旨在制造绝望和恐怖气氛,动摇公众对政府和议员们的信心,摧毁通常代表安全的行政管理机构”(Burton M. Leiser, *Values in Conflict*, New York, 1981, P375)。滥杀无辜是恐怖组织实现目标的惯用手段。我们可以设想,如

果类似的恐怖组织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如作用与 SARS 病毒相似的病毒和致命的细菌,并将它们用于人口密集的地区,其后

果多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总结防治 SARS 病的经验教训,即便我们面对这类恐怖袭击我们也不会束手无策。从理论上讲,恐怖组织如果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能力,是可以获得生物武器的。随着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由政府资助和私人资助的生物工程公司、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实验室就可培养细菌和病毒。如果科技人员缺乏道德自律,如果有关部门疏于管理,如果国家和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防扩散机制,生物与化学武器一旦落到恐怖组织手里,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从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使用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到美国军人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枯叶剂,从希特勒对犹太人使用毒气到麻原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我们都可以看到生化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前瞻性地思考问题并采取预防性的手段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佳选择。

4

人类最终会战胜 SARS 病毒,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是否有必要更深刻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等等问题。在这里,重温一下著名哲学家约纳斯的理论对我们也许不无启发(约纳斯是德国哲学家,他的代表作《责任原理:技术文明

时代的伦理学探索》是一本在西方不断再版,至今已销售超过二十多万的名著)。在约纳斯看来,世界上不仅人有生存的权利,自然(动物,植物及其生态环境)也有生存的权利。人有人的尊严,自然也有自然的尊严。人在弘扬人的意志自由的尊严的时候,不应该抹煞自然的

尊严。今天,我们也许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并同意自然也有尊严的看法,但稍加理性地思考,就会赞同约纳斯关于人比其它动物更多地

负有对自然的责任的观点。科技的发展与巨大进步使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人不仅具有破坏自然的能力,人甚至具有彻底毁灭自然、毁灭整个生态环境的力量。可是,当整个生态环境被毁灭以后,人类自身还能存在吗?约纳斯认为,正因为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优势地位,人对一切生物的存在就负有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更是为了人本身的生存,为了“人类世世代代生存下去”,这是技术文明时代伦理学的主题。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依靠技术对自然的人化,自然界的变化的确不断增大,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质量结构上,而且表现在时间结构上。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技术化正在成为改变我们的文化并内在于这种文化的内在必然性,它影响着所有的生活领域。技术既改变着无生命的物

相关书目

《责任原理:

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

约纳斯著,

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A.N.Whitehe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Leonardo-Welt》,

Juergen Mittelstras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的本性，也改变着自然界的生物的本性，并将最终改变人自身的本性。上帝造人的时代正被人造人的时代所取代。人越来越成为人的作品。但人在成为自身作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打开自然界。当这个打开的自然界失去自我保护、自我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时，它除了成为人的坟墓还能成为什么呢？

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怀特海早就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环境的可变性日益增强，可是人们却用一种只在固定环境论中才能找到根据的思想习惯来解释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人不仅用原有的固定思想习惯（如，在农耕时代，人的数量较少，人捕捉和吃掉野生动物还不会影响自然界的总体平衡）来解释这种可变性，而且用技术的力量来加强这种可变性。如，因大量使用抗生素而导致的细菌和病毒变异，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之后，老鼠因变异长得像一头猪，在许多地方青蛙长出了三只眼睛，等等，所有这些不过是技术不断地增强自然的可变性的小小插曲而已。

人在以技术手段加速自然物变异的同时也加速着自身的变异。人不仅以空前的速度以同性恋来改变异性恋，而且以药物和技术手段改变自己的身心（如改变体形和情绪），甚至以技术手段制造人自身（如试管婴儿和克隆人的尝试）。人以技术手段加速了动植物的生长，人也直接或间接地加速着自身的生长。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个不自觉地食物链中摄取激素的儿童如良种鸡般长大，我们的心情难道没有一种说不出的沉

重？不仅如此，人还在以技术手段来制造人的器官，并把这些器官移植给病人。这当然能给千千万万人带来福音，但是，当人试图把动物的器官移植给人时，人是否应当考虑一下这些动物器官会将可能携带的致命细菌和病毒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传染给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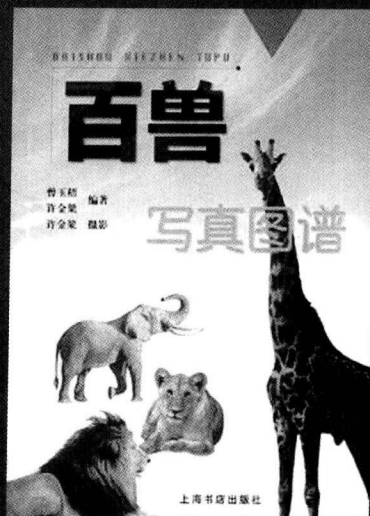
显而易见，今天只有过于偏执的人才会反对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技术在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以空前的速度加大了人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它的价值是人赋予的，人怎样使用技术，人把技术用于合理的目的还是用于不合理的目的决定着技术的前景和人自身的前景。因此，糟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对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技术是并且只应是实现人的合理目标的手段，而不应当成为人的目标本身，更不应当成为人的自我毁灭的潜在工具。

人改变并建造着自己的生活环境，人在与自然隔绝的同时却以为自然真的被隔绝了，人在人化的自然中生活却以为那个自在的自然不再给我们以根据感、家园感。今天的人仿佛生活在一种无起源无根据的时代，因而也生活在一种只讲索取不知感恩的时代。批判“起源”、批判“连续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祸根。

其实，人并不缺少保护自然的手段，也不缺乏保护自身的手段。人能以技术的方式介入自然并参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人也就能以技术的方式医治自然的创伤。人缺少的仅仅是对自然的责任感、虔诚心和感恩情。

2003年5月7日

汪堂家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百兽写真图谱》

许金梁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30.00元

2003年版

**精彩纷呈的动物世界，
一百多种兽类的
多姿多彩的容貌及其生活特性。
不少兽类
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
已到了
濒临灭绝的境地，
成为世界或我国珍稀动物。**

我的“非典”笔记



■ 汤拥华

联 想

“非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气势太宏大了，就像一幕露天上演的戏剧，无论你站在哪里都是它的观众。在工厂街道、在乡间村头，每当这样一出大戏上演时，整个夜晚都是它的，无论你是在台下欣赏着，还是在自家里忙碌着。甚至于男女趁此良机幽会，浓情蜜意之际，耳边响着的也总是那嘹亮的鼓掌声。这并不协调的背景音乐，往往能使笨拙的情话火一般地燃烧起来，瞬间便将两颗心烤得通红滚烫。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非典”真的很像一出戏吗？也许吧，你看，它有开端、发

展、高潮，还必定会有尾声，它像一出戏那样完整。它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驻足观看。这种观看不会是无动于衷的，我们为剧情的发展揪心，心中强烈地感受着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与恐惧”。更重要的，所有人还都在这出大戏中扮演着某个角色，主要的，次要的，幸运的，不幸的。以一个角色的身份与另一个角色相逢，这种感觉如此奇妙。一种特别的默契在传递，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有着台词般饱满的意义，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折射出脚灯的光来。

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生活！几乎没有什么

会议了，也不要想着逛街或去图书馆，在宿舍里呆着，老老实实地呆着。洗手，通风，交流一下彼此的忧虑，然后是看书。黄昏时候，统统从房间里出来，锻炼。

另一种生活！被隔离的宿舍楼下进行着一场 party，校长送的生日蛋糕系在窗口垂下的绳子上，旗帜似的徐徐上升。一时间，掌声四起，泪花闪耀。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隔离区里的大学生们激动地说。谁还会坚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没有被隔离的人们也不能再睡懒觉了。每天上午八点半宿舍消毒，绝大部分的人都被赶到了太阳底下，围坐在一起，一边吃早点，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这种习惯延续到午餐，有人找来报纸在楼下草地上铺开，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别人打扑克。饭都是用自己的盆打回来吃的，杯盘狼藉地在报纸上摊着，一个懒腰伸出来，顺势就躺倒在草地上。总有人嗓门特大，惹得宿舍里的人朝下张望，有笑骂声从楼上传来。

另一种生活！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医生和护士成了“最可爱的人”。有人牺牲了，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一贯紧张的医患关系涣然冰释。

另一种生活！“非典”黯淡的底色上闪烁出光彩。在又一个暖融融

的上午,一位老博士不好意思地说:不知算不算罪过,我已经有点留恋现在这种生活了。

快乐地恐惧着

中午去开水房打水,看见门口收钱的管理员指着一个向外走的小女生呵斥道:“喂,喂!你怎么跑到开水房里洗手来了?!”

小女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细声细气地回答说:“不要紧,阿姨,水不是很烫!”

打开水后出来,又看见前面一个女孩子朝我身后喊:“老大!你也太久了吧,我都等了半年了!”

后面一个女孩子远远地回答道:“真的有半年了吗?‘非典’过去了吗?”

真是一个绝妙的中午。一下碰到两个典型的“非典”笑话。这些日子以来,幽默比恐惧生长得更快。“非典”为幽默提供了绝好的题材和明朗的语境,以及更重要的——自嘲的快乐。自嘲是石头底下伸展出来的幽默,这让人感觉不坏。

还有别的快乐。晚上,我们这栋楼里出了一个高烧38°的人,上下慌作一团。于是我打个电话给家里,父母颇受惊吓。我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又打给女朋友,她没说什么,可过了一会又打过电话来,像是非常生气。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告诉我那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是吊儿郎

当的?你是要表达什么呢?

我要表达什么?这问题并不让我茫然,却让我慌乱。想了想我说:那是为了让你不要担心。这个回答一说出来,女友就干脆利落地挂上了电话。

你看,找一个敏感的女友是多么郁闷,想要炫耀一下自己的镇定都这样困难。生活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我们的恐惧与不恐惧都同样真实。但仅仅真实是不够的,恐惧与不恐惧都需要夸张,都需要炫耀,否则它们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虚无。必须让它们汹涌起来,成为风,成为大风。

闷闷地呆到晚间,有人前来相告:那位发高烧者已证实并非感染上了“非典”。果然,一丝遗憾从心头溜了过去。

生死有命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进入“非典”时期以来,这句话老是挂在嘴上。一位家在内蒙的好友告诉我,当他打电话给父母,嘱咐他们多加小心的时候,父母回答他的就是这句话。这让他一下子松弛下来。

命!多么亲切的一个词。不管我们是否认真地对待它,它都默默地守候在那儿,等着为我们提供安慰。一千条生命,几乎就能有一千种结束的方式,“非典”也好,“艾滋”也好,“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马拉美语)

偶然!偶然能为人提供安慰吗?

也许,但不一定。偶然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偶然也不能使悲剧成为喜剧。而且,偶然是这样的一种危险,它使悲剧成为完全偶然的悲剧,这几乎能取消悲剧的价值。我感染上了“非典”,这是人类的不幸吗?不,这首先是我的不幸。这是我必定遭遇的不幸吗?不,这完全是一种偶然,我本来可以不用在那个时间上街,我完全可以不用那个碟子。就是这偶然使我病倒,并有可能使我永远离去。弥留的时刻,我甚至没有勇气总结我的一生,为偶然而生的懊恼会让我想不下去。

完全偶然的悲剧。所有的悲剧不都是完全偶然的悲剧吗?只要一点点变化,悲剧就不会发生,或至少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发生。我这样想着,那一双故作轻快的腿不自觉地就慢了下来。

人 类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愿听天由命的,因为我们不是个人,我们是人类。“人定胜天”,请相信这个伟大的群体。

当我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我曾在一篇作文中由衷地感谢上苍,他让我那么幸运,可以作为一个人人类出生,而不是一只草履虫。这样的感慨后来是不大有了,因为做人艰难。我相信,如果草履虫也可以写作,那么它除开抒发对上苍的感谢之外,一定来不及做其他事情的。

但这只不过是玩笑，我仍然热爱人类并且相信人类。有人说，人类就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所以才会遭到“非典”的惩罚。我不会反驳这样的话，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不正是因为一次次战胜像“非典”这样的灾祸，人类才会自我感觉良好的么？人类也许不是战无不胜的，但它难道要对那些可以战胜的东西恐惧吗？难道它要用一条实际上看不见的界线阻挡住自己的脚步吗？人类是无法恐吓的，能被恐吓的只是个人，以及个人化的群体。

个人，人类。人类太伟大了，太复杂了，不管你怎么想象，你也摸不到这种伟大与复杂的边界。但正是这种无边的、不断发展着的伟大与复杂让我心虚，一个如此简单的个体，有资格自称“人类”么？这样想着的时候，一种别样的恐惧也增长起来：在今天，作为一个人类活在世界上，太复杂、太沉重、太难得潇洒了，因为你不得不加倍地珍惜自己。这样一个精彩的世界，这么多令你瞠目结舌的奇迹，你作为人类的可能性在一刻不停地膨胀着。你舍得去死吗？你舍得从这一个庞大的的人类共同体中剥离出去吗？你能坦然接受仅仅在你身后一两个月，那夺去你生命的病毒已成为小菜一碟吗？我想你咽不下这口气。

因此，每当我不得不在街上行走时，对“非典”的恐惧总是达

到高峰。不是因为增加了感染的可能，而是我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如果我离去，我失掉的将是怎样一个壮丽的世界，而人类却毫无损失。

羊群与人群

在“非典”这类风波中，盲从是很受指责的，太多的人稀里糊涂地干了一些完全不必要的事情，比方抢购板蓝根、白醋之类。这些人中当然也包括我。听说人们疯狂抢购那些东西，最初的感觉是觉得可笑，但是笑过之后就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跑到超市里。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买到，两手空空地回来，越发添了一份担心。

后来当然不免有些为自己的盲从惭愧，但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那种花上一百块钱买一瓶白醋的事我是不会干的。不买这醋，我未必能成为病人，买了我就很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但这样的确信其实也一点点被消磨着，我开始想，不买到底是因为明智还是因为吝啬？如果我父母想要，我会给他们买上一瓶吗？如果给他们买了，我会顺带着给岳父岳母捎上一瓶吗？既然他们都有了，我难道不给自己也准备一瓶？三百块钱就这样花出去了。我的懊恼是注定了的。

社会心理学把盲从称为“羊群效应”，羊群总是跟着头羊走

的，这是本能。后面这个人指的是“个人”，被认为是可以而且应该作理性选择的。个人总免不了盲从，盲从是不理性的，因此要受责备。就在这人因盲从而受责备的当口，社会心理学跳出来说，盲从多多少少是人的本能，不宜苛责太过。这当然是一番好意，算不得是侮辱人。

但“羊群效应”用在人身上总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管选择多么像本能，选择也仍然是选择——它仍然应该是理性的、自主的，即便盲从也采取着这理性与自主的形式。其实就个人来说，哪里有那么多的理性，哪里能总是自主呢？更多的时候他是茫然、犹豫，不由自主的。“非典”，“非典”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巨大的谜团让一包小小的板蓝根，一瓶再普通不过的白醋也神秘起来。常识，常识是够用的么？一种新的疾病总是成功地扫荡了大部分常识。在“非典”面前谁也不能安之若素，他必定会在某一环节上盲从。偶然的、较有节制的盲从与乐此不疲、成为习惯的盲从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

——有。是的，我的回答是“有”。羊群也好，人群也好，也许都避免不了盲从，但羊群与人群仍然是不同的，因为人会因为盲从而羞愧，因盲从而后悔。并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无论他们如何身不由己，他们也应该对所有那

些不想盲从的人——不管他们是
否因此得利——无保留地表现出
尊敬与宽容。

人可以盲从，但不可以为自
己的盲从辩护。我不知道自己能
否一直记住这一点。

戴，还是不戴？

这是一个永恒不协调的意象：
一个戴口罩的人挤在一群不戴的
人中间。

戴口罩的理由并不充分，专家
们的暧昧给人增添了不少烦恼。但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你怎
样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在一群不设
防的朋友面前，将你多少有些可笑
的口罩戴上。你并不想拒人于千里
之外，你依恋着他们，并且需要他
们的谅解，为你的煞有介事，为你
的过分小心。

你可能会喊起来：过分？这一
点都不过分！好吧好吧，请原谅我
们的粗暴，就这样吧，就这样戴着
口罩同我们大家走在一起吧！是
的，我们不该觉得别扭，不管谁戴
着口罩，他都是不受指责的。这是
“非典”时期，恐惧已经为一切过分
或不过分的谨慎提供了理由。我们
知道这不是炫耀，口罩上充满歉意
的眼神让我们也充满歉意了。如果
我们不能保护你，至少应该让你保
护自己。我们不会把这视为是从友
谊的战线上撤退的，因为友谊不是
战场，友谊是港湾，友谊是家，友谊

就是你的口罩。勇敢地、大大方方
地把口罩戴上吧！

但我自己也许会选择 not 戴，可
以吗？你能宽容我吗？如果我这副
百无禁忌的样子让你觉得难堪，甚
至忧虑，你会原谅我吗？你会把你
的抱怨隐藏在口罩的那一面吗？

罪

“非典”时期，“无所谓”是一
种罪。你无所谓地出行，无所谓地
归来，无所谓地拜访和接待你想拜
访和接待的人，甚至于无所谓地打
着震天响的喷嚏……这都是罪，是
罪就要被宣判，我们宣判你被隔离
两个星期。

隐瞒是另一种罪，更不可饶恕
的罪。你隐瞒你身体的温度，隐瞒
你猛烈的咳嗽，隐瞒你危险的行踪
……你不仅为自己隐瞒，你还为亲
人隐瞒，为朋友隐瞒。你的隐瞒谁
也保护不了，却伤害了所有人。是
罪就要被宣判，我们宣判你被隔离
两个星期。

软弱是另一种罪，最最骇人的
罪。因为软弱，你拒绝检查，拒绝医
院，拒绝传染病房，你不顾禁令逃
出学校，逃出工厂，逃出医院，逃向
父母之乡。你乘坐的火车成为你的
罪证，你的软弱所引起的恐惧，拉
出一条几千公里的浓烟，然后向四
周弥散。是罪就要被宣判，也许我
们不该只判你被隔离。

罪——你不要误会，我们并不

根据危害的后果给你定罪，我们根
据的是你是否对禁忌服从。后果太
可怕了，那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现在你要做的是对你行为本身负
责。

你觉得委屈吗？你觉得自由受
到了侵犯，隐私没有被尊重？收起
这一套吧！你的自由和隐私从来就
是被集体的意志赋予的，现在我们要
收回一部分了。

“友情的损失是要我自己承担
的！”这是你的抱怨吗？这真让人同
情。但是同情之外，我们还得提醒
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将你那不
合时宜的来访者拒之门外。他的来
访是包藏祸心的，请相信这一点，
任何可能让你脱离集体的来访都
是包藏祸心的。如果你因拒绝而损
失了友谊，那么这友谊早该放弃。
我们就给你解释这么多，“非典”时
期的耐心不能只分给你一个人。

粗暴？你谴责粗暴？你谴责谁
的粗暴？没有“谁”对你粗暴，是集
体对你粗暴，难道集体不可以对你
粗暴吗？你也可以这样对别人粗
暴，如果他对集体犯下了罪。你是
不受指责的，除开集体以外，谁能
真正指责一个人？集体，集体，集体
是一个无限广大的人类，集体就是
你的归宿，你的原则，你的热情和
想象力。是的，想象力，你要勇于用
想象力去理解集体的利益和它面
临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非
典”时期。

反 抗

反抗也是一种罪。这罪更甚其他,因为它在制造恐惧的同时还制造了尴尬。一间寝室的门上贴出这样的告示:

“本宿舍谢绝喷洒消毒药水,未经允许,请不要擅自开门。睡眠时间1:00-9:30。”

这些天来,因为早晨要消毒,我们只好早早地起床,把上午的时间分一部分在阳光下,食堂里,以及小河边的长凳上。虽然不无抱怨,但这种改变很快就习惯了。消毒,为了谁?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反抗者。

为什么一定要早晨消毒呢?学校发了一份“非典”预防手册,翻开一看正好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回答是:

“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早晨消毒效果好,能更有效地预防‘非典’。”

好吧好吧,既然是这样的回答,那么反抗也就反抗了吧!有一次碰到那反抗者,问他为什么贴那样的告示,他说你不觉得味道难闻死了吗?再问他后来别人还有没有人来消毒,他说没有啊。哈,原来反抗的动机和效果都来得这么容易。

偌大一栋宿舍楼,留下这么一个房间神圣不可侵犯,对别人是否是一种不公平?我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我回答不了。那么,我为

此而担心吗?是的,因为我并没有完全不用担心的理由。那么,我愤怒吗?不知道,但如果我强令那反抗者把告示撕下,我想我对自己会更愤怒(而他的愤怒当然也是可以预见的)。我能做什么呢?每次我经过那张告示时,我都会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反抗啊!我想快步经过,但实际上我却总是慢下来。我一遍遍地看那几行文字,每次都有异样的感受。“应该将这个房间从这栋楼切割下来!”有一次我竟然这样想。然后我就四处打量,看这栋楼会不会因此而倒塌。

自为的限度

在一篇小杂感中,我谈起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我说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关心伊拉克人民,但我仍然厌恶战争。原因是如果开战,“我”有可能会被一颗莽撞的炮弹击中,然后以一个枯燥数字的身份去死。也许“我”能赚得一点来自异国他乡的叹息,但“我”的亲人将长久哭泣。

这类感叹也没有什么新意,“自为”历来就是有限度的。我们无法阻止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我们每天都在充当着这样的数字。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巨大的标签,就是一堵墙,挡住了我们看自己的视线——但问题是,我们在朝自己看吗?我们有耐心把自己看个究竟吗?

不会的,我们不会永远将心比

心地理解他人,我们对自己也常常不耐烦。“非典”时期尤其如此。我不知道他人是否应该被隔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随它去吧,隔离吧,将我,将他人。何必为自己辩护呢?对别人表明自己是多么健康?为别人证明他是如何没有危险?假想有一个远方来的客人,我接待了他,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难以拒绝。然后我被隔离,我不会说“这多么可笑”,隔离是合理的,我所做的已足够我接受这样的待遇了。被当成一个可能的传染源,这感觉是奇妙的——作为一个硕大的病毒,居然还能思想。“我这不是很健康吗?”你每时每刻都会对自己说,你每时每刻都在反对这个非“自为”的身份。原来的程序被颠倒过来,你曾那么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因此才会对任何注视的眼光都心存警惕。“别人会怎样看我?”这样的问题弄得你筋疲力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多么苍白的安慰,甚至不能坚持一个小时。哪里比得上倚靠着隔离所的窗台看太阳,把每一声鸟鸣都记在心里,心怀悲悯俯瞰那大千世界,作一首雕词琢句的诗。“我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你看我多么自由!”这个“你”就是自己,到这时自己才算把自己好好看过。

当然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前提:我活着。我可以病,但我必须活着。活着我就可以幽默,可以深刻,可以坦然、泰然,可以让别人惊讶。死